

## 第九章 獨立、和平與民主勢力的發展

### 第一節 日本統治階級走投無路

國際帝國主義不論在殖民地或其本國，也不論在亞洲或西歐，都被迫陷於四面楚歌之中。唯其如此，它們才窮兇極惡地拚命地企圖從戰爭中找出路。它們強迫日本簽訂諸如“行政協定”之類的露骨的殖民地化條約，督促日本重新武裝，以及要求對反對重新武裝的愛國的和平人民加強法西斯鎮壓，是由於它們的危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遠東逐年擴大的緣故。而吉田政府與日本反動勢力之所以忠實地遵循其主子的意旨，拚命推進重新武裝，並千方百計地企圖使國會把防止破壞活動法及勞動關係法修改得更惡毒，以便繼承佔領法令，也不外乎因為它們的危機不論在經濟上或在政治上都是越來越深刻，而日本國民的反抗運動不但日益高漲，並且含有新的性質的緣故。

充當美國軍事產業承包商的極端畸形的日本經濟，自一九五一年秋季開始，加深了它的恐慌的程度。在這一年的秋季，紡織業和貿易公司繼續不斷地破產倒閉。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底，這類行業倒閉的計有二百六十家，其中負債一千万日元以上的七十家，負債總額竟達七十五億日元。出口數量最大的纖維製品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為頂點而走向下坡路。特別是棉紗的出口合同從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七百七十八萬九千英鎊銳減到一九五二年三月的一百三十一萬六千英鎊。一九五二年三月棉布出口也比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約減少了一半。特別是在一九五

二年三月十一日英國政府宣佈將進口削減三億英鎊，而禁止日本的未經漂白的棉布進口後，以此為開端，馬來亞、澳大利亞、新嘉坡、錫蘭、巴基斯坦以及南非聯邦相繼採取了限制進口的措施。因此使一向宣傳日本經濟靠開發東南亞便可維持而把東南亞說成好像是日本殖民地的日本政府及買辦資本家，大為狼狽不堪。与此相反，鋼鐵製品的出口則有了顯著的增加，一九五二年三月出口合同從同年一月的十六萬噸增加到將近三百萬噸，但在同樣鋼鐵製品中的薄板和鋅板等用於和平產業製品的出口則大為減少了。在對美出口方面，由於美國採取了限制日本金槍魚罐頭和陶器進口的政策，以致日本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日本不但出口的前途日益黯淡，而且對國內市場也不能寄以希望。根據官方統計，被服品的消費水平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二月平均比一九五〇年同一時期降低了百分之四點一。而這種情況在一九五二年也絲毫沒有改善的希望。由於纖維製品陷於恐慌，製造纖維品的機械也不再需要，因此鑄造這種機械的生鐵也完全賣不出去了。

生產過剩不僅發生在纖維製品和紡織機器等方面，而且波及染料、塗料、肥皂、橡膠、皮革以及紙漿、造紙、肥料、工作母機、鋼鐵等幾乎所有產業部門。其結果，使通商產業省終於不得不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對一百零六家紡織公司發出勸告，勸它們自同年三月開始的三個月內將生產縮減百分之四十。因此有三千名女工被解僱；在農村因找不到工作而出賣肉體的婦女也日益增加，這使人們大為痛心。生產縮減繼續擴大到橡膠、化學纖維、蘇打、油脂等部門；而在鋼鐵部門，到了一九五二年四月也不得不將薄板和鋼絲的生產縮減十分之四到一半。即使是資本家們所仰賴的美軍“特需”訂貨，自一九五二年以後也開始逐月銳減。

為了擺脫這種日益深刻的經濟恐慌，大壟斷資本所選擇的

道路，是日益加強其對美國戰爭經濟的依賴——不獨依賴不穩定的美軍“特需”訂貨，而且依賴強制推行日本重新武裝，從而依賴軍需生產——的道路。它們“夢想再一度”藉戰爭經濟大發其財，即使不能復活舊日的“大日本帝國”，但是希望能從美國多少分沾些利潤。它們為着要硬把日本國民帶到戰爭道路上，不得不進行法西斯的鎮壓。這也就是說：它們所以採取片面依靠美國的賣國的、戰爭與法西斯的政策，並非由於它們在經濟上的強大，而是因為它們在經濟上的日益削弱。

然而日本買辦勢力在全國人民的激烈反抗下，其內部已開始分裂了。它們之中的第一個集團主張修改憲法以便公開重新武裝，它們企圖憑藉重新武裝的軍事力量使人認為，雖然是奴隸，但對其主人似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發言權。它們利用國民大眾的民族意識，進行“自衛”和“獨立”的虛偽宣傳，夢想將舊“大日本帝國”復活到某種程度。代表這一集團的，有自由黨的鳩山派和民主黨的蘆田派。代表第二個集團的，則為目前的吉田政府。這個集團正如大藏大臣池田所公開表明的一樣，是恬不知恥地企圖出賣日本以便充當“美國的小老婆”，並想尽可能索得較高的價錢。它們一面聲稱“決不重新武裝”，實際上却用最大的速度擴充殖民地土著軍；而目前推行“防止破壞活動法”及其他一切法西斯政策的，也正是這批人。在推進法西斯政策這一點上，第一個集團也不亞於吉田政府；但因為它們目前是在野黨，所以還對吉田政府的拙劣做法進行“批判”。兩個集團均以巨大的壟斷資本、天皇、上層官僚及農村的封建勢力為基礎，當第二個集團因遭受國民的憤恨和憎惡而無能為力時，扮演著後備軍角色的第一個集團將出面取而代之。

傲慢不遜誇稱為“唯我獨尊”的吉田對自由黨的統治目前已經很不順利，而鳩山等人正在展開積極活動，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美國之所以在“和約”的名義下允許給予日本表面上的“獨

立”，只是在表面上裝出對於日本人民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讓步，但實際上却想藉此建立新形式的殖民地統治。因此美國不但認為如吉田和池田這類公開甘願充當“小老婆”的人物有用，同時也需要像鳩山和蘆田這類偽裝的民族主義者。因此，究竟是哪一派能夠更好地服務於其主人，能夠更巧妙地欺騙日本國民，這種無恥的鬥爭就不得不日益加劇了。

自從簽訂兩個條約以來，在久未執政的民主黨內部，就曾發生了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集團與類似自由黨鳩山派的集團之間的对立。而這種对立雖在“反對吉田政府”的目標下掩蔽了一陣，但到了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終於在煽動政治家的指揮下，並吸收了新政俱樂部和農民協同黨的大部分成員，而改組為“改進黨”。改進黨的政綱雖然標榜所謂“民族的自衛與獨立”和“糾正資本主義的弊害”等，但不久即在一九五二年五月決定將被判處七年苦役而刑期剛滿的甲級戰犯重光葵擁為該黨的總裁，並且公開主張重新武裝。這就完全証明了改進黨的主力派是鼓吹戰爭之輩，因而也就是要將日本變為美國附庸國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下，諸如北村派（指北村德太郎一派——譯者）等具有民族主義傾向的集團，早晚將脫離該黨，否則就是屈服於主力派。他們究竟選擇哪一條道路將取決於他們的良心和今後國民鬥爭的發展如何而定。

美國經濟危機的加深，與美國迫使日本簽訂“美日行政協定”及“日蔣條約”等欲將日本變成美國奴隸化的極端露骨的高壓政策的實施，其所以在時間上完全一致，不外說明這兩者之間，即經濟危機與使日本殖民地化及軍事基地化之間，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而這已經給予全體日本人民以非常明顯的印象。因此甚至連資本案之中，那些日益強烈反對吉田政府的片面依靠美國政策、反對戰爭政策、開始要求與中蘇兩國進行貿易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這表現在資本案們對於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

的深切關心上、表現在高良富女士的訪問蘇聯及簽訂中日貿易協定上。而這竟使民主黨及參議院綠風會的一部分議員對於批准對日片面“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甚至曾公開表示反對或在投票時棄權。即使是那些倣效杜勒斯和吉田口吻大肆稱讚兩個條約的資產階級大報社，也不得不对“行政協定”多少吐露一些不滿的論調。這是因為國民大眾為爭取獨立與和平的鬥爭已經成長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所致。

## 第二節 革命勢力的新開端

### 一 日本共產黨的新綱領

一九五一年八月，日本共產黨針對着對日片面“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欲使日本永久變為美國的附屬國和戰爭基地的意圖，向黨內提出一個日本共產黨的“當前要求”的草案，並令全黨進行討論。同年十月日本共產黨召開第五次全國協議會，正式決定將該草案作為綱領，並把它貫徹到國民中去。新綱領分為如下四章：（一）“美國的佔領怎樣使日本人遭受痛苦？”（二）“吉田政府是美國佔領制度的精神的、政治的支柱”，（三）“民族解放民主革命不可避免”，（四）“革命的力量——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戰綫”。新綱領除分析了日本的形勢和日本共產黨應與國民共同爭取當前的要求外，並說明了應如何達到這個目標。新綱領明確規定了目前日本的革命是從美國佔領制度下爭取日本民族解放的革命。並且認為在這個革命“過程中第一個決定性步驟”是打倒充當佔領制度的“支柱”和“幕布”的、背叛民族利益的日本反動勢力，即打倒“天皇、舊的反動軍閥、特權官僚、地主和壟斷資本家這些剝削和鼓勵剝削日本國民的人們”的政府，而建立新的民主政府。

新綱領規定，這個為爭取民族解放的民主政府在對外政策

方面應實現：(一)根據波茨坦公告實行全面媾和，以保證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主權，(二)取消在日本的佔領制度，從速由日本撤退一切佔領軍，(三)和一切國家建立和平關係並在經濟與貿易上自由合作，(四)擁護和平、禁止戰爭宣傳。在“國家制度”方面則實現：廢除天皇制，建立民主共和國，採取人民具有罷免權的一院制國會及其他民主主義制度，保障基本人權等。在對“農民問題”上應實現：“沒收一切寄生地主、皇室和其他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並無代價地分配給農民”；予農民以“無償使用水利和水利設備的權利”；並採取“旨在發展農業生產力和提高農民生活的各項政策”，以及“取消半封建的漁業稅”及其他有利於漁民和漁業的政策。新綱領特別強調的是採取革命手段在農村中徹底廢除各種半封建關係及其核心的大地主制度。新綱領把大地主視為美國佔領制度和日本賣國反動統治的最重要的支柱。在“工人問題”上新綱領主張：“規定工人和職員的最低工資，同工同酬，無性別、民族的區別”；“實行一切工人八小時工作制。坑內勞動六小時制”。此外諸如徹底改善工人生活，廢除半封建性的剝削制度，保障工會的自由發展和集體合同權等，均必須予以實現。

如果認為實現上述“當前要求”和建立旨在完成這個任務的民族解放民主政府，可以“不受阻礙地採取和平辦法”達到目的那就完全錯了。吉田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繼續維持美國佔領制度，“不但擁有軍隊和警察，而且還有美國佔領當局、地主、壟斷資本家、天皇及其周圍勢力的援助”。因此，新綱領認為針對這種情況“必須組織國民進行嚴重的革命鬥爭”。而“這個解放鬥爭的主要力量是工人、農民，他們是日本國民的絕大多數，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將“決定吉田政府及佔領制度的命運”。但是“需要聯合起來反對反動勢力的階級不僅是工人與農民。受佔領制度及吉田政府反動法律壓迫的手工業者和小商人，會參加工農聯盟。而且參加這個聯盟的還有中小企

業主和很多大企業主，甚至大商人，他們同樣受到佔領制度和吉田反動法律的害處。”不問其社會地位如何，凡是熱望日本獲得自由與獨立，希望日本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能獲得獨立自主權的一切人們，都會參加工農聯盟。日本共產黨認為加強和發展這個“民族解放民主統一戰綫”是它的緊急任務，並且號召一切進步人士，特別是工人和農民，立即加強和發展這個統一戰綫。

這個新綱領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革命的目標和途徑。日本共產黨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召開的中央委員會第十八次擴大全體會議上，決定黨的緊急任務是應為結束美國佔領制度和打倒吉田政府所代表的國內反動勢力而鬥爭。但是這些決議未能對當時的日本情勢作充分明確的估計，因此就未能決定革命的主要行動。但目前這種模糊不清和認識不足的情況已不復存在了。

## 二 統一行動的發展

當日本共產黨開始以新綱領號召建立民族解放民主戰綫時，即自兩個條約簽訂後到同年（一九五一年）年底，在煤礦、金屬礦山、電氣工業、交通運輸、造紙及纖維工業等各部門，工人以要求提高工資為中心的罷工繼續不斷地擴大。這種工人大眾本身的鬥爭，已經不是墮落的右翼幹部的壓力所能限制的。一九五一年年底甚至在三越百貨公司，即在這種封建性的傳統和壓迫最厲害的、連職員都要特別謹慎地從小市民階層中選擇的地方，也發生了以女職員為主力的連續二日的罷工。這時候，數百名武裝警察隊襲擊了柔弱的女售貨員組成的糾察綫，並恣意加以拳打、腳踢及其他一切暴行。光天化日之下，在首都東京最繁華的街道上，當着數萬市民面前所犯下的暴行，使一切小市民也都看清楚了日本警察的真正面目。

雖然這些爭議是經濟鬥爭，但與此同時，反對兩個條約，反對殖民地化，反對重新武裝和反對法西斯的宣傳也擴大了。一

九五一年十一月，“總評”宣佈“非常狀態”，對吉田政府發出警告說：工人階級對政府所製訂的“團體等規正令”、“禁止總罷工法”等計劃，將以全力進行鬥爭，並在全國範圍內召開了抗議集會。以“總評”為中心組織了“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簡稱“勞鬥”），並着手準備採取行動。因此，吉田政府不得不暫緩將這些反動法案提交國會討論。

對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具有決心的先進工人們，開始在工作場所建立抵抗和自衛的組織。在軍需工廠，以反對戰爭的明確意識、製造不合規格的成品或拖延生產的鬥爭也開始萌芽了。

在農村中比過去更加深刻的鬥爭開始在各地展開了。例如長野縣南佐久郡，自一九五一年十月起以貧農和山林工人為主，廣泛的統一鬥爭開始發展起來了。由於五月的霜災、夏季的旱災、九月以後的凍災和稻熱病災，這個地方的農作物有的全部遭災，有的減收三成至四成。貧苦的鄉民苦於沒有米吃。然而不但捐稅照常徵收，還削減了地方平衡財政津貼，使鄉民的生活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陷於嚴重的苦境。於是根據日本共產黨的號召，一九五一年十月成立了包括幾個村議會議長也一起參加的地方自治研究會，決議除要求國家對災荒給予賑濟和減免稅收外，並反對批准當時已提交國會的對日片面“和約”和“美日安全條約”。地方自治研究會的要求得到了南佐久郡內各種團體的普遍同情，於是不僅在災荒賑濟和豁免稅收等問題上進行鬥爭，而且還進行了解放國有山林和爭取自行支配郡內產米的鬥爭。於是縣政府當局動員全部警察到南佐久郡進行鎮壓。站在鬥爭前列的共產黨員不斷橫遭非法逮捕。抗議這種非法鎮壓的鄉民與力圖鎮壓這些鄉民的警察隊之間發生了小衝突。而各報則將這場衝突稱為日本共產黨對警察的集體暴行而大肆宣傳。

不論是在東京西部的山村地帶、九州的大部分地區、北海道各地、富士山麓及其他各地的貧農地區和山村，凡是在土地被徵



爲美軍或警察後備隊的基地和演習地的地方，農民的鬥爭都是相當尖銳的。在漁村方面，如在九十九里濱及其他各地，漁民爲了維護生活，不得不羣起對將海面奪去充當美軍的海上演習地進行鬥爭。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爲了強行擴軍備戰不得不佔用土地；換句話說，民族壓迫已以盡人皆知的形式波及到了土地，這勢必引起農民展開民族鬥爭。

這些在工廠裏和農村中的自衛和反抗鬥爭，還在萌芽時期，還沒有發展到全部羣衆都有了政治覺悟而加入鬥爭的階段。然而已經顯出這樣的方向，這是值得注意的。

日本國民爭取和平與獨立的鬥爭，博得了國際性的崇高的聲譽和鼓勵。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的大山郁夫——日本擁護和平委員會常務委員，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作爲“反對戰爭、爭取和平”代表人之一獲得了“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以“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贈予大山郁夫，不僅是表揚他個人在悠久的時期以來特別是戰後在日本領導和平運動的傑出貢獻，同時也是對日本國民和平運動的一種評價和鼓勵。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駐日美軍總司令李奇微在其對日本國民的新年致辭中說：“在新的一年中將看到對日‘和約’的生效和日本將作爲‘自由國家’的一員，而創造日本歷史上的新局面。這個新地位無疑地將帶來新的問題和新的責任”。他用這種抽象的語言巧妙地暗示了“自由國家之一員”也就是成爲美國附屬國的日本，應承擔諸如重新武裝等“新的問題和新的責任”。與此同時，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應共同通訊社的請求，對日本國民發出了如下的公開信：

“請轉告日本人民，我祝他們自由幸福，我祝他們爲爭取他們的祖國的獨立而進行的英勇鬥爭獲得完全勝利。

以往蘇聯人民自己曾經歷過被外國佔領的痛苦；這種佔領

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曾參加過的。因此蘇聯人民完全理解日本人民的苦難，深切同情他們，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像蘇聯人民過去曾經做到的那樣求得他們的祖國的新生和獨立。

我祝日本工人能夠免除失業和工資低微的痛苦，消除大眾消費品價格高昂的現象，並祝他們維護和平的鬥爭得到勝利。

我祝日本農民能夠免除無地和少地的痛苦，取消重稅，並祝他們維護和平的鬥爭得到勝利。

我向全體日本人民和知識分子祝賀，願日本的民主力量完全勝利，這個國家的經濟生活得以恢復和發展，民族文化、科學和藝術得以發揚光大，並祝他們維護和平的鬥爭得到勝利。”

斯大林深切地理解到全體日本國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所最關心的中心問題，並鼓舞日本國民為此而鬥爭。共同通訊社曾要求世界十八個國家的領袖對日本國民發表新年獻詞，其中只有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一個人給予了答覆。而這是不論美國總統或英國首相都絕對無話可說的。

在這新的一年中，爭取獨立與和平的信心增強了，鬥爭也有了新的發展。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八日，東京大學的學生在東京澁谷車站前，徵求市民在為反對重新武裝和反對預料中的徵兵法上簽名，曾遭受二百名武裝警察的鎮壓。警察對於法西斯主義者每天在這個車站前的廣場上進行促進重新武裝的演說，絲毫不加干涉，然而它決不允許發表反對重新武裝和呼籲維護憲法的演說。本應以維護憲法為職責的警察竟公然來禁止呼籲維護憲法的演說！這就是美國式、吉田式的“自由”和“和平”。平日就對這種情況感到憤慨的學生，看到連簽名運動也遭到鎮壓，於是毅然進行了抵抗。當學生進行抵抗時，立即聚集了二萬市民，他們都對學生加以支持，於是警察隊失敗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東京大學學生發現了三個便衣警察潛入該校演劇會場進行特務活動。特務警察的筆記本落入学

生的手中。根據這個筆記本，發現不僅學生運動不斷遭受偵察，而且特務警察還對愛好和平的民主教授的歷史進行調查，甚至基督教團體也被秘密加以偵察。對“赤色分子”和“共產黨”的迫害與鎮壓是決不止於此的，這意味着是對一切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鎮壓。這種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西斯主義歷史所証實了的事實，豈非又在日本出現了嗎？對於這種事實，學生和知識分子原已略有所知，而這種確鑿證據的出現，益使學生和知識分子痛切地感覺到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重要性。

此外，在資本家之間要求促進中日貿易和要求參加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的運動也逐漸擴大了。

隨着吉田首相致函杜勒斯公開表明只和“台灣政權”締結和約，以及“美日行政協定”正在談判的消息有所傳聞以後，日本全國國民的不安和不滿逐漸增高了，而在舊金山所簽訂的兩個條約的本質也越來越被人們認識清楚了。於是組織廣大的國民統一戰綫的客觀條件已開始成長起來了。

統治階級爲了轉移在國民中逐漸高漲的反抗情緒，爲了削弱和分裂國民統一的可能性，首先必須割斷共產黨與國民的聯系，於是它們捏造了一個“日共暴行”事件。當時常常發生向警察署或稅務局等——平常被國民所憎恨的中心——政府機關投擲火油瓶的事件。因此，政府和所有宣傳機關盡量地鑽這個空子，事實却被巧妙地歪曲，進行了好像人民曾遭受襲擊的宣傳。並進一步捏造了毫無事實根據的“日共暗殺警察”事件。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發生了札幌警察署白鳥警佐被人槍殺的事件。於是統治集團蠻不講理地把共產黨員和工會積極分子作爲這個事件的“犯人”加以檢舉。從檢舉數月後還不能起訴的事實來看，可以了解該事件與一九四九年的下山事件、三鷹事件以及松川事件同樣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吉田政府一面捏造事件力圖使輿論轉移到於自己有利的方

面，同時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將前述的“團體等規正令”法案改為“防止破壞活動法”案而提交國會討論。不管政府用什麼樣的藉口，國民是會受騙的。甚至反對共產黨的人也已經從戰前的“治安維持法”的經驗和最近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中，充分了解到這個鎮壓共產黨的法案就是立刻要鎮壓全體國民的法案。所有的人都一致奮起進行了粉碎“防止破壞活動法”的鬥爭。

以“總評”為中心的“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所領導的四百萬工人是這個鬥爭的主力。私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鋼鐵工會聯合會、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化學工會、全日本金屬礦山工會聯合會等大工會，都把一九五一年底的鬥爭繼續下來，自一九五二年初起，為反抗資本家的反攻進行了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總評”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發表了“工資綱領”，力圖以此為基礎統一各廠礦的要求。工資綱領算出了保證生活的最低工資，要求實現這個最低工資和給予一般性的社會保障。據稱：這是為了反對國內外統治者通過殖民地的、封建的職務等級工資制來分化工人階級和試圖保持殖民地軍事監獄般工資的束縛，而製定出來的統一工人階級鬥爭的綱領。然而最低工資的一般性抽象要求，反而會混淆賣國性的壟斷資本與非壟斷資本之間的區別，而成為阻礙工資鬥爭向反帝鬥爭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實現工資綱領，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為爭取和平與民族獨立而鬥爭，保障包括工人團結罷工的權利各種民主權利，取消重新武裝費用和佔領費，以及對中蘇進行自由貿易等等。這就是說，鬥爭形勢已發展到沒有政治鬥爭便不能實現經濟要求的階段。而工會會員羣眾從殖民地奴隸生活的痛苦體驗中懂得了這個道理。在這種羣眾的壓力下，“總評”幹部也就決定把反對重新武裝和反對修改勞工法規的政治要求與提高工資及其他經濟要求，同時列為春季勞動攻勢的中心口號。

在這個時期，吉田政府簽訂了“美日行政協定”，並與台灣逃

亡政權進行談判一個準備將來與人民中國進行戰爭的所謂“和約”，這使國民愈益痛恨日本的殖民地化與戰爭基地化。因此，有組織的工人怎麼能不與之進行鬥爭呢？一九五二年三月一日，由“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主持，在全國召開了“粉碎鎮壓法規總奮起大會”；這個大會在東京錦糸町公園舉行，有六萬工人參加，大會結束後並舉行了示威遊行。這是反對“防止破壞活動法”鬥爭的前哨戰，也是工人階級向反對戰爭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前進的標誌。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即當內閣會議正式通過“防止破壞活動法草案”之日，吉田政府勒令共產黨非公開報刊“和平與獨立”停刊，不按照法院的法律手續非法搜查了一千八百五十家住宅，並以違反第三二五號政令為理由逮捕了許多人。據警察發表稱：“和平與獨立”是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二日發行的週刊報。最初發行三千份，而在这次遭到大舉鎮壓時，已改為日刊發行到第一百三十號，銷數已達十萬份左右。這是作為“赤旗報”的後繼報第二十五次被勒令停刊的全國性報紙。截至一九五二年二月底，全國被勒令停刊的報紙包括地方性報紙在內計達一千八百一十八種（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朝日新聞”）。不管怎樣遭到鎮壓和迫害，被迫停刊的報紙接連復刊到二十五次甚至到三十次之多，而這種日報的銷數一會兒就達十萬份。在以世界上最嚴密的警察制度見稱的而且又在帝國主義佔領下的日本，怎麼能夠進行這種鬥爭呢？那是因為這種鬥爭代表着日本國民要求和平與獨立的難於抑制的願望，而且這種願望又為鬥爭所鼓勵與保護的緣故。

“防止破壞活動法案”不外是美帝國主義及日本賣國勢力用以鎮壓日本全國人民要求和平與獨立的武器，以便代替佔領時期根據美軍當局命令所製訂的第三二五號政令和“團體等規正令”。在這個法案剛剛提交國會後，“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

員會”立即發表聲明，預備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舉行反對該法案的罷工，並要求政府撤回該法案。政府則以勞動大臣吉武爲中心着手瓦解“總評”幹部。鍋山、三田村、星加等“愛國勞工運動”派與內閣官房長官保利茂相勾結，千方百計地策動瓦解工會；社會黨左派的一部分幹部則與勞動大臣吉武試行談交易。根據第六十九期“前衛”雜誌揭露：四月十日夜十二時許，政府方面的勞動大臣吉武和勞政局局長賀來、日本煤礦工會同盟的委員長武藤（“總評”主席），事務局局長小椿和副委員長柴田，以及中間人國營鐵道工會的愛國勞工運動派星加要 and 加藤閑男等人曾聚集於東京“築地”的三井寮。當時政府方面提出了如下方案：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幹部應採取實質上取消罷工的行動，並由三井財閥捐出三千萬日元作爲活動經費，而政府保證這筆款項可以由他們自由支配。武藤提出的方案是：如果政府將“防止破壞活動法”修改成僅限於鎮壓共產黨，則不舉行罷工。這也是社會黨左派議員赤松等人的方案。於是這筆交易就以吉武接受了上述要求結束了。會後他們就陶醉在醇酒與藝妓之間了。

日本政府和資本家一方面進行收買，另一方面則威脅說：政治罷工將以違法論而加以禁止，並解雇其負責人。“朝日”“每日”“讀賣”等各報紙雖然也批評“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將起與從前治安維持法同樣的作用，而對於工會的罷工則站在政府的立場，責難罷工是破壞議會政治的行爲。但是正因爲這種“議會政治”不僅不能確實保證民主主義，反之，却要通過這種法西斯法案，因此工人才不得已舉行罷工。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日，吉田政府向“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的幹部約定，將以明文規定“防止破壞活動法”不致壓迫工會的“正當行爲”並答應從事其他的“修改”而要求停止第二天即將舉行的罷工。“反對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研究了這個“修改”，認爲這是不值得稱爲“修改”的無意義的東西，因此決

定堅決舉行罷工。然而武藤等人主張應該先看一看政府是否修改，然後再決定罷工與否。他們完全背叛了工人和國民，使得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及全日本金屬礦山工會聯合會的三十三萬工人脫離了四月十二日舉行的首次罷工。因此四月十二日先由全日本汽車產業工會和全國金屬產業工會的十萬工人開始舉行二十四小時罷工；參加這次鬥爭的，包括一小時至四小時限期罷工和抗議集會在內，總共才有三十萬人左右。於是吉武得意洋洋，而自由黨幹部們則評論說：“武藤是勞工運動的國寶”（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朝日新聞”）。

武藤一派的背叛行為引起了全體工人階級的憤怒。由日本煤礦工會同盟所屬礦山地帶的北海道和九州各工會，對武藤紛紛發出抗議電報，礦山代表於四月十六日抱着堅強的決心來到東京，徹底地斥責了武藤等人的背叛行為。另一方面，政府和資本家看到首次罷工的挫折，進而採取積極的攻勢，決定如果工會舉行第二次罷工則徹底加以鎮壓，並對“總評”幹部進行了收買和威脅。據說，包括武藤在內，所謂“總評”“委員長集團”的大同業工會委員長們也開始退縮了。然而在廠礦工作崗位上的羣衆的憤怒非常強烈，由於來自下層的压力，“總評”也不得不於十八日發出舉行罷工的指令。因此，日本煤礦工會同盟、全日本金屬礦山工會聯合會、私營鐵道工會總聯合會、鋼鐵、海員、全日本汽車產業、全國港灣等各工會於十八日開始了二十四小時罷工，參加人數有一百零七萬人。此外，如“全國官公廳工會”等被剝奪了罷工權的工會以及其他廠礦，則採取召開抗議大會、請假戰術、拒絕超額勤務等方式，參加這個鬥爭的約有二百萬人，總共超過了三百萬人。與一九四七年“二·一”鬥爭相比，不僅廣泛地動員了有組織的工人，而且是以更為具體的、更為明確的政治目標動員起來的。實際上這已成為日本從未有過的規模最大的政治罷工。

这是工人羣衆自下而上爆發起來的罷工。工人通过这次的行動，開始具体地体会到了爲完成維護民主主義、反对战争和民族解放任務而鬥爭的目標。日本煤礦工会同盟由於出現了叛徒武藤，於是自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召開了歷時三日的臨時大會。武藤等人企圖操縱大會，將警察和暴力團引入會場來阻碍旁听者入場，但這個陰謀被粉碎了。他們企圖阻擋代表們提出質問的陰謀也被粉碎了。因此，代表們對於工会幹部加以徹底地追究，將預定舉行三天的大會延長了兩天，否認了四月十二日延緩罷工的決議，也否認了對要求撤回“防止破壞活動法”這種原先決定加以修改的決議，明確認定必須爲撤回“防止破壞活動法”而鬥爭到底，並改選了工会幹部，清除了武藤、小椿以及其他六名叛徒。日本煤礦工会工人的這個勝利不僅只是日本煤礦工会同盟本身的勝利，而且是日本工人階級驅逐賣國的領導人的鬥爭第一階段的勝利。

在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總罷工中蘊藏着一種巨大的力量，它必將激起國民對於民族獨立被剝奪的怒火，並使之發展成爲爭取獨立的鬥爭。早就苦於分裂的工人階級，通过这次鬥爭，開始發出了自下而上的統一行動的萌芽。日本煤礦工会同盟大會也是其表現之一。不久，要求“在人民廣場舉行和平與獨立的統一五一節”就高漲起來了。

“反对修改勞工法規鬥爭委員會”所領導的罷工，對國民全體也起了很大的啓蒙、教育和鼓勵作用。學生、知識分子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運動也日益加劇。日本文化人會議、自由人權協會、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日本律師會、日本新聞協會、日本文藝工作者協會以及日本作家協會等文化團體也發出了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聲明，各大學頻繁地召開了學生抗議集會。甚至連日本學術會議這樣一個保守的國家機關，也在第十二次總會的最後一天——四月二十三日，以贊成一百零五票、



反对四十九票，棄權一票通过了反对“防止破壞活動法”的声明。

### 第三節 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

——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新階段——

#### 一 从“和約”生效到五一節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和約”生效日及五月一日的五一勞動節在日本全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高漲中即將來臨了。一九五一年的五一節曾遭受分裂，並被禁止使用人民廣場，但在羣衆強烈要求一九五二年一定要舉行一個統一的五一勞動節的壓力下，“總評”的幹部也不得不压制一下愛國勞工運動派的氣焰，表示擁護舉行統一的五一勞動節。“總評”並且認為政府禁止使用皇宮前廣場作為五一勞動節會場是非法的，因此向法院提出了請求撤回禁令的控訴。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夜，在東京後樂園舉行了中央五一節前夕的慶祝晚會。參加晚會的計有三萬五千人，要求在人民廣場舉行爭取和平与獨立的統一五一勞動節的呼声响徹了整個會場。散會之後有數千工人和学生自然而然地組成了遊行隊伍，向水道橋方向前進，並与武裝警察隊發生了衝突。兩天以後，東京地方法院判決禁止使用皇宮前廣場是非法的，但吉田政府仍然不准使用廣場。這是因為數十萬國民聚集於位置在駐日美軍總司令部与日本反動勢力中心地點的皇宮之間的廣場上舉行爭取和平、獨立与民主的大規模示威集會這件事情本身，使吉田政府感到戰慄的緣故。日本政府甚至無視它的夥伴——法院的判決，愈益加深了工人和一般國民羣衆的憤怒。

恰在這時，即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藉对日片面“和約”的生效，吉田政府和統治階級為了慶祝日本的“獨立”，頒佈了一次大赦。於是一切寡廉鮮恥的罪犯均被釋放，而資本家們數千

万日元數億日元的巨額漏稅也被一筆勾銷了。然而國民中爲了活命而出售黑市大米等的輕微經濟犯以及因違反佔領法規即第三二五號政令而被投獄的或正在受審的人們，却不在大赦之列。又如被美軍軍事法庭非法判以間諜罪的飯田七三等人，雖一度被美軍釋放出來，但立即又被日本政府逮捕了。這個“大赦”千真萬確地暴露了“和約”的本質。大資本家和賣國勢力戰爭罪犯等雖被美國“大赦”，但要求民族獨立與和平的日本國民和靠勞動生活的一般國民，却依然被關在美日反動派的軍事監獄裏。與片面“和約”生效同時，“美日安全條約”及“行政協定”也一齊生效，這就是宣告祖國的滅亡。因此，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的学生們以罷課向祖國的敵人表示抗議，他們羣集於東京大學舉行了東京都全體學生奮起大會，號召工人和學生爲爭取獨立、和平與民主而合作。會後當學生隊伍向日本製鋼公司赤羽工廠和石川島造船所等地行進的途中，因遭武裝警察的干涉而發生了衝突。當愛祖國而要求和平與民主的人們經常遭受日本政府的暴力鎮壓時，一切愛國者究竟應該怎麼辦呢？

不論在什麼意義上來說，“和約”生效不僅未使日本獲得獨立，反而驅使日本永遠走上殖民地奴隸化的道路，這是不必反覆重述的。只是從這一天起，美國佔領軍改稱爲駐日美軍，而將從前由佔領軍最高司令官兼任政治最高權力者的職權，分由駐日美軍司令官與美國駐日大使來掌握而已。在法律上和形式上，美國駐日大使的地位，當然與其他各國大使毫無不同之處，他也完全沒有像原佔領軍最高司令官那種可對日本政府發號施令的權限。然而在事實上他却具有自由操縱日本政府的力量。

美國首任駐日大使羅伯特·墨菲是以總督的身分來日本的。墨菲在第二次大戰前，曾在瑞士、德國、西班牙和法國歷任副領事或領事的職務，他在間諜活動和陰謀工作方面在美國人中也是最有手腕的一個。他自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開始曾在北非

從事陰謀與間諜活動達二年餘，他在北非用收買或威脅的方法迫使維希派的法國將軍停止抵抗聯合國軍，對於美軍在北非登陸的作戰準備有過“貢獻”。當時的美軍司令官就是現任駐日美軍即美國佔領軍司令官的克拉克上將。其後墨菲參加過聯合國軍（美軍）對意大利和西德的管理工作，他在一九四九年出任駐比利時大使，曾以迫使比利時重整軍備而馳名。與墨菲勾結起來統治日本的另一人物的克拉克上將也是一個冷酷的陰謀家。他在北非登陸作戰時，曾藉墨菲之助利用過法國軍隊。關於此事，他自己寫道：“我最需要的是使法國軍隊來參加共同作戰的工具。這個工具，不管他叫做達爾朗（法國駐北非總督），吉羅德（法國將軍）或是貝當（投降的法國總統），無論叫什麼名字都可以。為達到目的而利用了工具之後，應如何處理被利用者等問題，就無暇及此了”（“朝日週刊”雜誌，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而現在，克拉克也許想說：“我最需要的是驅使日本人走上戰場的工具。這個工具不管是叫做吉田茂、重光葵，或社會主義者，以及天皇，無論叫什麼名字都可以……”。然而日本人民決不會允許他們的計謀得逞的。他剛剛到任就在駐日美軍即佔領軍司令部門前所發生的事件，就保證了這一點。

爭取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一日舉行一個統一的五一勞動節終於實現了。然而中央五一勞動節的會場不是在人民廣場，而是在青山明治神宮外苑。四十萬工人、學生、旅日朝鮮僑民、近郊農民、勞動市民都滿懷着鬥爭的勇氣和信心陸續不斷地集合起來，日本全國有三百萬人參加了五一勞動節的鬥爭。以“總評”為中心的五一勞動節執行委員會經過羣眾討論所決定的中心口號，除“反對重新武裝、爭取民族獨立”、“以統一鬥爭打倒低工資制”外，還有口號二十三條，這些口號獲得了全體勞動人民的衷心響應。此外，在中央五一勞動節會場上特別通過了“反對非法強制遣送朝僑和華僑！”“促進勞動戰綫的統一！”“堅持締結全面

和約，廢除行政協定！”三條補充口號，並在全場鼓掌聲中正式通過了粉碎“防止破壞活動法”以及“配合反對‘防止破壞活動法’和修改勞工法規的羣衆鬥爭，繼續爲爭取使用人民廣場而鬥爭”的決議。必須強調這些決議並非根據什麼人的陰謀“利用羣衆的心理”強加於大會的，而是與其他一切決議相同，先由執行委員會同意和提出，並經大會正式通過了的。

一九五二年五一節，紅旗、工會旗和各自精心設計的標語牌淹沒了葉綠風和的青山會場；這些標語牌的絕大部分都是當天的中心口號；也就是當天所高喊的口號，即反對重新武裝，爭取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廢除片面“和約”、“美日安全條約”和“美日行政協定”，美軍立即全部撤退——“美國佬滾回去”，以及打倒吉田賣國政府。許多人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首相的畫像報以掌聲。在這一天復刊的“赤旗報”飛快地賣完了。當大會進行中間，要求“到人民廣場去示威遊行”、“用實力奪回人民廣場”的呼聲，不斷地從參加大會的羣衆中發出來。實際上來到這個容納四十萬人未免太小、連演說都不易聽到的會場一看，羣衆迫切要求以實力奪回人民廣場的決意就越來越高了。政府禁止使用人民廣場這件事，在這一瞬息之間不僅只是一個集會方便的問題，而是具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這就是，它使日本人民深切地体会到，被奪去自己的廣場和自己的祖國的日本人民已經變爲殖民地法西斯主義的奴隸了。因此奪回人民廣場，就是爲奪回獨立與民主而鬥爭的具體鬥爭之一。

## 二 在廣場上的鬥爭

過了中午，結束了大會而轉入示威遊行。指定了以日比谷公園爲目的地的中部和南部地區的工人們，以東京交通工會爲前列開始行進；但在青山一丁目附近，約有七、八千名的學生、自

由工人(未加入工会的工人——譯者)和民主青年团员等的示威遊行隊伍却追过东京交通工会而成爲前鋒。他們高喊“美國佬滾回去”、“打倒吉田內閣”的口號，並對乘坐着美國人的汽車和美國人的住宅，大叫“美國佬滾回去！”他們在自由黨本部和首相官邸前面把隊伍變成彎彎曲曲的蛇形行列舉行示威，並且更高聲地大叫：“反對重新武裝”、“打倒吉田內閣”。自由工人充滿憤怒，曾用石子投擲玻璃窗。於是，在午後二點鐘左右，約有兩萬人的示威遊行隊伍到達了日比谷公園。

示威遊行隊伍未曾在日比谷公園停留下來。他們響應了羣衆之間有一個人的提議：應該立即實行大會的決議奪回人民廣場，於是就離開了公園。他們以民主青年團和打着蓆子旗的自由工人爲前列，下面接着是高舉着國際學生聯合會旗子的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會的学生、舉着金日成首相的肖像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旅日朝僑、以及全官公廳工會聯絡協議會、印刷出版工會、全遞信從業員工會等八個工會的隊伍，一共約五千人。他們排成嚴整的陣容向前行進。在日比谷的電車交叉點，約有一百名武裝警察隊曾揮舞棍棒襲擊示威遊行隊伍，但示威隊伍用旗竿和標語牌的柄趕散了他們，並繼續向馬場先門的方向前進。街道的右邊是駐日美軍——佔領軍總司令部的某棟建築物。於是羣衆喊着“美國佬滾回去”的口號，並把街道左邊排列着的美軍高級人員的汽車玻璃窗打破了。在美軍司令部前面街道正中間，一位激昂的、披頭散髮的、自由工人模樣的五十多歲的老太太，狂熱地揮舞着手，啞着嗓子，鼓勵着示威遊行隊伍。在街道上走過的公司職員們，也對青年們的勇敢表示感嘆。

在馬場先門的人民廣場入口，有二列橫隊約一百名的武裝警察站在那裏。在警亭旁邊的數輛警察汽車也來回開動阻塞了道路。在午後二時二十分左右，一度停止前進的示威遊行隊伍，

把隊伍緊緊地連在一起與警察隊對峙起來了。示威遊行隊伍被後面繼續到來的隊伍不斷推擠，像漲潮似地前進。被這種團結似鐵的嚴整隊伍所壓倒，警察和警車後退了。當時，警察指揮官曾對他的部下說：“讓他們通過這兒，放他們進去後再揍他們”。這些話和後來警視總監田中在衆議院法務委員會上所作的証言是一致的。田中作証時說：“這件事（奪回人民廣場）是預先就知道了的。因為考慮到在外面馬路上幹起來會使一般行人受傷，所以採取了放他們進入廣場後再幹的方針”。但是警察們在這個廣場入口的鬥爭中，決不只是進行了預定的退却，他們也是被壓倒而退的。當時，羣衆中響起了“已經進入了人民廣場！”的喊聲。於是示威遊行隊和着“使勁！使勁！”的嚷着，立刻向着二重橋附近突進。這時，從意外的方向對示威遊行隊伍送來了如雷的掌聲和聲援。在廣場的護城河旁邊，在河堤上、在草地上，嚥着吐沫想看個究竟的年輕婦女、夾雜着許多公司職員和行人的數百名羣衆，一齊對示威遊行隊伍的成功，發出歡喜的呼聲。其中有些人一面拍手，一面和示威隊伍同向二重橋旁邊前進。

午後兩點三十分，在二重橋豎起了紅旗，國際歌響徹天空。先頭的示威隊伍剛剛鬆一口氣，後繼隊伍就進來了。在這一瞬息間，在廣場前面俟隙以乘的、誇稱爲警視廳第一方面預備隊的最精銳的三個中隊，從示威遊行隊伍的右邊跑過去，向二重橋前的坡上突進。當他們剛剛進到示威遊行隊伍的側面時，隊長一發出“進攻”的號令，數百名警察就像野獸一樣揮舞着櫛木的棍棒襲擊起來了。從馬場先門到這裏，既沒有受到任何警告，又沒有受到任何撤退勸告而受到意外襲擊的學生和工人們，譁然崩潰了。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工人和學生任意撲毆，用棍棒打開了頭，絆倒婦女，對倒在地上的還乘勢毆打。大約有三十名男女被亂打倒地了。

附近一帶都染滿了鮮血，呻吟声震驚着人們的心胸。工人和学生清醒過來，又整理好了隊伍。於是，除了拿着標語牌的柄和投擲落在當地的小石頭外再沒有別的東西可利用的民衆，不禁燃燒起對兇惡殘暴的賣國警察的無比怒火和憎恨，就用肉搏開始反擊。在敵友混雜的大格鬥中，捲入了羣衆中間的警察，被許多工人和学生圍着用標語牌的柄亂打了一通。警察一面流着血，一面抱着頭，發出“嘻嘻”的無恥笑聲。這樣，警察隊也搖搖幌幌地一直被追到二重橋附近去了。這時從馬場先門進來的示威遊行隊伍的後繼隊伍也陸續集合上來，總共達到一萬人左右。警察軍方面也以第一方面預備隊的全体人員（六個中隊）和由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方面預備隊中各抽二至五個中隊，總共十九個中隊約有三千人投入進來了。警察軍突然向示威遊行隊伍投擲了數十發催淚彈。勇敢的青年們拾起催淚彈投回到警察方面去。但因警察準備有防毒面具，並且根據他們的戰術計劃處在逆風的位置；所以處在順風的民衆就被青白煙所包圍，以致眼皮紅腫，禁不住淚水直流，而喉嚨和鼻子也喘得受不住。警察軍看見示威遊行隊伍有些萎縮，於是拿着手槍追趕上來了。在催淚彈和手槍的攻擊下，示威遊行隊伍節節後退。不斷有人受到重傷。被打傷了腳而倒下來的學生和不能動彈的工人，被警察們痛加毆打，並要帶上手銬逮捕他們。對於這種殘忍暴虐的程度，連資產階級報紙的採訪記者也看不下去而提出了抗議。儘管如此，警察們還是把染滿了鮮血倒在地上的人用警車帶走了。

一度實行了大退却的民衆，重新整理好了陣容。警察軍一面背着二重橋的護城河，一面向着日比谷公園採取了鑰匙型的隊形。民衆與警察軍之間隔着約三十公尺，也採取了同樣的隊形彼此相持不下。可是不久，警察軍的一個中隊長——好像是加藤警部——從隊伍中跨前幾步，向密集着的示威遊行隊伍開了四發手槍。這並不是爲了“威嚇”而朝天開槍或對脚開槍，却

是對着胸膛開槍。於是以此爲信號，警察軍又一面揮舞棍棒、投擲手榴彈、亂射手槍，一面對羣衆進行了襲擊。這又使許多人民流下了鮮血。國民救援會的人們，以救人性命爲目的，拚命地從事治療負傷者的工作。但惡鬼般的警察甚至對他們也曾加以襲擊。民衆越過通往祝田橋的中央大道，退至楠公銅像附近，在那裏又恢復了原來的隊伍，於是夾着中央大道與警察軍對峙起來。每當有美國的汽車通過的時候，民衆就照準它投擲如雨般的石子。

這時候，從祝田橋方面來的第二批人們——以南部地區的工人爲主——又陸續到來了。午後三點多鐘，民衆的數目，把示威遊行隊伍和來“看熱鬧”而與示威隊伍合流的市民加在一起已達數萬人（據報告，對人數的估計，有三萬至十萬之差）。而發生最大的混戰是在午後三點半鐘左右。估計警察軍的人數也超過了五千人。警察軍在這時候，已經像饑餓的狼羣看見了鮮血似地發狂了。他們投擲催淚彈，亂開手槍，對民衆進行了襲擊。民衆中有帶着大鼓的工會隊伍，那正好像打得及時的戰鼓一樣。在廣場的日比谷公園附近一帶，展開了大規模的混戰。數百名民衆受了傷。東京都職員工會的高橋正夫，在楠公銅像附近，當與數名警察格鬥時，因子彈從背後穿過心臟和肺部而致死。美國人統治菲律賓時，爲了鎮壓這個勇敢的民族的抵抗，曾經特別製造了大型的手槍；這種大型手槍比日本三八式步槍所射出的子彈還要大。年輕的事務勞動人員高橋正夫，就是被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用這種大型手槍所殺死的。

其後，就變成了分散在廣場各處的流動戰鬥。從午後四點多鐘起，民衆就走过祝田橋向日比谷公園移動。當時已將排列在街道兩旁的美國佔領軍高級官員們的汽車和警視廳的汽車，共計燒毀了十四輛。由幾個人口中喊着一、二、三同時用力，很簡單地就把汽車翻過來，於是在汽油浸流出來的地方用火柴點



燃，汽車就立刻燒起來了。一般市民也是一面看着一面拍手；或者是和示威遊行隊伍一同來推翻汽車。從這時候起，民衆雖已在各自解散，但在日比谷公園，混戰仍繼續至傍晚。

警視廳和檢察局，在這天立即給這般民衆加上“騷擾罪”的罪名，戴上“暴徒”的帽子，並開始逮捕他們。警察在所有的電車、火車站以及交通要道都佈下羅網；凡衣服上染有血跡的人，凡頭部或他處有外傷的人，不管是誰都被突然逮捕並投入牢獄。無論是憲法、刑事訴訟法或人權都不曾在他們的眼中，他們是硬要越多製造一個“嫌疑犯”越好！他們並曾命令東京及其近郊的一切醫院——外科不用說，甚至小兒科、產科、眼科、大概是一切醫生——對該晚以後的外傷病人都要向警察告密。雖然按照醫生法的規定，醫生有為病人保守秘密的義務；但是希望越多製造一個“暴徒”越好的檢察官和警察，却毫無人道主義、民主主義、法治主義的觀念，竟肆無忌憚地強迫醫生違反其法律上的義務，來犯出賣民族英雄這種人類最可恥的罪惡。

警察對在廣場上身受重傷已頻死去的人，還加以踢打；對不能動彈的人還加以毆撲；他們真是極盡了殘暴兇惡的能事。我們相信，至少有七個人是被警察這樣殺死了的，但警察却極力地加以隱瞞。不僅如此，警察甚至闖入醫院，對必須絕對安靜的重傷病人，由數名警察在病牀邊進行兇暴的、長達數小時的訊問。對於因受重傷住在醫院的、既不能逃走又不能隱藏的日本人，究竟有什麼必要必須爭一刻的時間到病牀邊來進行深夜數小時的訊問呢？警察並不是為了搜查上的必要而這樣幹的，只是為了能多一個也好，能早一點鐘也好製造出“暴徒的首魁”，對無法抵抗而倒下去的人們大肆中午的報復。即使是昔日的封建武士道，對受傷而倒下的敵人，也認為應該親切地加以扶抱。並且認為去砍業已倒下了的人是武士的最卑怯的行爲。而今日的美國走狗——警察和檢察官，竟對受重傷不能動彈的人民還要加以

襲擊，以圖滿足他們卑劣野蠻的殘虐性。因此，法政大學的學生近藤巨士，就出於在病牀上受到深夜的訊問，以致腦內出血病狀惡化而死了。這樣在人民當中，就有兩名已知的死者，還有數名連姓名也不明、遺骸也不知弄到何處的死者；此外，則有數百名重傷者。警察軍方面，據說有八十三名負重傷，有七百餘名負輕傷。此外，美國人和澳大利亞人有十二人負傷。人民被檢舉者，至五月底止，已超過一千人。

資產階級報紙對於警察如此程度的兇惡殘酷的無數暴行，居然完全不作報道。不僅如此，还把示威遊行隊伍將警察和美國兵投入護城河、當他們向上爬的時候會棒打石擲之類的事情，形容得簡直像是天人所不容的大暴行似地來大肆宣傳。因此，只看資產階級報紙的人，即使是平常相當進步而且對資產階級報紙給以輕蔑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居然也說是警察固然不好，而人民也不見得好等等。但是親眼看到那一場面的人們，不能不確信，警察是徹頭徹尾地壞，而人民方面則是完全沒有過失的。廣場的鬥士們顯示了爭取民族獨立與和平的勇氣，作出了自我犧牲和同志愛的無比模範。被殺死的高橋正夫，就是在為援救同伴而以一人與數名警察交手時被從背後開槍打死的。近藤巨士是看見警察去踐踏倒在地下的女學生，因救她們而被警察的棍棒打傷致死的。他們在那一瞬息間成了怎樣崇高的人物，請看看新時代社發行、“赤旗報”編輯部編輯的“血的五一節照片集”就可以知道了。在照片集上，顯出在這以前日本人表情中完全沒有過的、美麗的、有力的、充滿了對敵人的仇恨和對民族的熱愛的感動人的人們的姿態。